

李立三的革命动员策略与安源路矿大罢工

姚 远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长沙 410000)

摘要:安源路矿大罢工是近代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立三为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场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李立三的革命动员策略主要有三个方面:创立新组织,加强路矿工人的政治动员;开设福利机构,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开办工人夜校,加强路矿工人的思想政治动员。这些革命动员策略为党在之后开展工人运动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李立三;安源路矿大罢工;革命动员策略

中图分类号:D231;K261.35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9)02-0032-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9.02.005

Li Lisan's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ailway and Mine Strike in Anyuan

YAO Yu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ailway and Mine Strike in Anyuan w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worker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whose success should be greatly attributed to Li Lisan, the early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Li Lisan's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were as follows: to create new or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workers in the railway and the mine; to establish welfare institutions to improve the workers'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to run a evening school for worker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ese strategies provided much experience for the Party to carry out the workers' mov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i Lisan; Railway and Mine Strike in Anyuan;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strategy

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唯有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罢工运动促进了路矿工人的觉醒,维护了路矿工人的权益,锻炼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为之后的工人运动的继续开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深化对安源大罢工的研究,对于我们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

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时代背景

安源路矿工人自身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以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内工人运动所产

作者简介:姚远(1994—),男,江西萍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生的溢出效应,共同构成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时代背景。

(一)工人的生产环境恶劣,工资水平低下

为了最大程度地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不足的问题,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果断引进境外资本和西方较为先进的煤矿开采技术来开发安源煤田,同时动用大量民工开建株萍铁路,至1906年末,两项工程相继完工投产,被当时的人们合称为安源路矿。与此相对的是,工人的生活生产环境和工作待遇却仍是十分恶劣,这体现在:第一,工人的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井下安全事故频发。“早晨下得矿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2],这些歌谣就是当时工人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为了节约工程成本,资本家往往不设置井下安全作业的装置,高温高湿的作业环境,遍布整个矿井的煤烟粉尘,一天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极大地侵害了煤矿工人的生存权,也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第二,工人的工薪非常低,一个煤矿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平均工资是0.27元,月平均工资是8.1元,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工人工资,“日本煤矿工人每日平均工资0.6元而月平均工资是18元,英国煤矿工人日平均工资是1.6元而月平均工资是48元”^[3]。相比较之下,我国煤矿工人的工资水平要低得多,此外,当时的路矿工人工资除了支付自身的伙食费外还得要支付“炸药费、用油费、安全费等”^[4],而且资本家对工人工资的各种克扣使得工人的实际工资常常不到应有工资的一半。由于路矿工人既缺乏通畅的政治参与渠道,又没有行之有效的行动组织,于是,暴力便成为路矿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的常用方式:如捣毁机器、反抗监工、杀死资本家,等等。但是暴力的反抗不仅没有带来生活条件的改善反而引来暴力的镇压,这就导致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安源路矿工人所承受的苦难和压迫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路矿工人运动提供了契机。再者“安源位于三省交界处,远离大城市,政府腐

败,控制力也相对弱,这也为中共向安源进行渗透与进行革命动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5]。

(二)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国际共运的影响

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的劳动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的有力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俄国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由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爆发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都爆发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压迫的反抗;在殖民地地区,当地的被殖民者也奋起反击。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到了工人群众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他们意识到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积极发动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为解决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切实的途径。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鉴于国际局势的迅猛变化,当时出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毛泽东为了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于1921年秋天和李立三前往安源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的到来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二、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大罢工中的革命动员策略

动员工作是工人罢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际作用上来说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罢工的全过程,甚至可以说动员的成效直接决定着罢工的成败,动员得越彻底罢工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动员的失误可能直接引发局面失控,最终导致罢工失败。因此,李立三十分重视革命动员的方式和策略。他把政治动员、经济动员以及思想动员结合起来,将各方面可以利用的势力和力量加以聚合,从而为罢工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创立新组织，加强路矿工人的政治动员

细致的组织工作是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毛泽东偕同李立三等人于 1921 年冬再次到安源做实地考察时就曾提议过，可以将当时在路矿内打工的工人们组成一个团体，叫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议提出以后在李立三等人的精心筹备之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于次年 3 月成立。

为了俱乐部的顺利组建，筹备委员会先后召开了多次委员会会议，分析路矿内外部的情况，并选举李立三同志担任筹委会主任，后又选举朱少连同志担任筹委会副主任，为了充实俱乐部的内部结构，扩展其职能，俱乐部还设立了文书股、宣传股、游艺股、会计股、工人监察队等办事机构，俱乐部会员也发展到三百多人。同年 4 月，李立三在长沙召开的湖南党组织会议上向当时主持湖南工作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俱乐部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内外部条件已经成熟，随即决定由李立三尽快返回安源路矿主持俱乐部的成立事宜。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设在牛角坡 52 号，俱乐部成立之后迅速发展，还在醴陵等地区建立了四个俱乐部分部，俱乐部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李立三等领导人的有力组织。李立三创制工人俱乐部的初衷是希望“培养德行，增进情感，团结互助，共创未来，使工人在俱乐部中得到锻炼”^[6]。俱乐部每周都有对工人进行的政治报告、通俗讲演、化装讲演、工人辩论会、研究会等。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让工人在参与俱乐部的活动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为以后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奠定组织基础；其次通过俱乐部内部的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提升路矿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让他们明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利益属性以及利益冲突等。

为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动路矿工人，李立三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安源地区创办工人夜校，培养共产党员，发展工人势力，并于当年

2 月期间成立了以李立三为支部书记的安源路矿工人党支部，“这是中国产业工人成立的最早的一个党支部”^[7]。党支部的成立揭开了安源路矿工人斗争的新局面。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政治组织基础，同年 6 月李立三又在安源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委员会，大力吸纳工人入团，并引导其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湘区党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在中共湘区党团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李立三还注重充分发挥湘区各级党支部在罢工过程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期间的所有重大决定及相关组织动员工作都是由中共党支部联合共青团团组织开会讨论，并经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工人俱乐部将党组织的有关部署付诸实施。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在正式罢工之前，李立三将工人俱乐部中的部分党员和团员安排进工人纠察队，以增强该支队伍的纪律性，确保工人纠察队听党指挥。这样就形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党员、团员为骨干，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为主要抓手的政治组织格局。安源路矿内的党组织以及团组织的建立，一方面使得党团的组织系统日趋完善，有利于增强党在路矿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力，为大罢工的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党团组织的建立也有利于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便利了工人群众之间的思想交流，在思想上增强了工人对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工人俱乐部和工人纠察队为组织载体来开展政治动员工作，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有效的。

（二）开设福利机构，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为了充实俱乐部的职能，提升矿工的福利待遇，李立三在工人俱乐部中增加了两个新机构：一个是劳动介绍所，另一个是故工抚恤会。两大机构的设置都是基于工人的生活需要。

劳动介绍所是专门处理俱乐部内部会员失业问题的，介绍所为失业会员提供相关的就业咨询，从而保障了工人的基本生活。故工抚恤

会是专门为了安抚和救济因工亡故的俱乐部会员的家属而设立的。一旦有会员因工死亡,俱乐部就会立即出面给予死亡会员家属以帮助,协助处理已故会员的后事,提供抚恤金,向路矿董事会争取补偿,等等。在李立三的带领下俱乐部福利机构的职能得以有效发挥,工人会员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升,这些新的举措提高了工人俱乐部在工人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1922年李立三参考欧洲工人运动的动员经验并结合安源路矿当地的实际情况,着手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同年7月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了,合作社是由安源路矿工人们出钱集资设立的,附设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内,总经理由时任安源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同志担任,当时有社员30余人。工人群体所需的布匹和日用品是合作社出售的主要物资,合作社以“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渐渐地加入合作社的工人数量开始增多。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创立目的是为了维护路矿工人的利益,以及保护路矿工人免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压迫。为了切实保障工人的经济利益,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仅提供棉、粮、油、盐等工人急需的生活用品,而且还提供银元兑换铜币的业务。当时“市场上一枚银元能兑换280枚铜元,而奸商们却趁机压价使得工人们只能兑换260枚,但是当工人们偿还银元的时候,一枚银元却要还280枚铜元”^[8],不合理的兑换率使得路矿工人的经济利益受到很大损害。为了保护路矿工人的经济利益,工人消费合作社从一开始就是按市场汇率来进行银元与铜元之间的兑换,替工人解决了兑换问题也就变相增加了工人的收入。除此之外,为了减轻路矿工人的生活负担,路矿工人俱乐部向会员们发放购物证,持有购物证的会员能够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工人消费合作社里选购生活物资,而不持有购物证的人也能在消费合作社里购买平价生活用品。消费合作社在物质上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自李立

三成立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后,路矿工人们的生活状况便开始逐步改善。一面是矿主和监工们的克扣欺压,另一面共产党和工人俱乐部的帮扶协助,强烈的利益对比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进一步便利了党的动员工作。

(三)开办工人夜校,加强路矿工人的思想政治动员

在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充分激发工人们理想信念的力量,这对于取得革命胜利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处于普遍贫穷状态下的工人群众能够认识到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立三来到安源路矿之后就在工人群众中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政治建设。可是安源路矿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如果强行进行思想政治动员恐难有效果,于是着手“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教工人们识字,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成为李立三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途径”^[9]。兴办教育的初期,李立三在一些工友的大力帮助下建立了工人平民学校,工友们不仅出钱出力还帮学校做宣传,四处张贴告示。在办学初期由李立三直接任教,在办学过程中李立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增大与工人的接触面,调查了解工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为日后发动工人运动积累了第一手材料。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兴办工人学校,其目的在于“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工人认识字,有了文化,才能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新思想,才能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10]。李立三在教煤矿工人识字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工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不失时机地在工人群众中发展青年团员、党员,以充实党的队伍。除此之外,“李立三等人还积极创办党校初级班,专门招收工友同志”^[11]。在李立三等人的影响下,工人们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他们不仅能够识字,而且对于新文化、新思想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进一步激发了工人阶级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为日后党发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

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李立三动员策略的实际效果及历史意义

(一) 动员策略的实际效果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主要采取的是罢工的方式,罢工运动的胜利取决于内外部条件的成熟。从工人群体内部因素来看,此次罢工必须把绝大多数工人动员起来,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力量来与反动势力作斗争;从社会因素来看,最大程度地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减少罢工的外部阻力这也是罢工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在大罢工之前李立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主要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效果。

第一,罢工动员工作既成功激起了路矿工人们罢工的决心,也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社会群众的同情,减轻了社会对于罢工的误解和恐惧。李立三在罢工时期所提出的宣传口号:“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吃饭;我们于死中求活;我们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每句口号无不诉说着安源路矿工人的悲惨遭遇,无不凸显了路矿工人所遭受的压迫,这些口号不仅增强了工人群体的内部向心力,也极大地争取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这也与罢工期间所采取的措施有关。安源煤矿内部有发电厂,而该发电厂提供了当时安源市近一半的电量,如果因罢工而关闭发电厂势必影响市民的生产生活,这对于争取舆论是极为不利的。李立三考虑再三,决定在罢工期间仍维持发电厂的正常运转,以最大程度地取得安源各界人士对罢工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罢工动员加强了工人群体的组织纪律性。路矿工人所遭受的压迫由来已久,在李立三来到安源路矿之前,工人们为反抗压迫而进行的零星抗争时有发生,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缺乏有力的组织是历次工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李立三到安源之后创办工人俱乐部,以工人俱乐部为组织载体,利用工人俱乐部在路矿工人群体中的影响力来锻炼工人的组织纪律性。为了稳定罢工后的秩序,李立三抽调俱乐

部会员组成多支纠察队伍。“纠察队队员佩戴红袖章,手持铁棍等武器,在附近工厂街道巡逻,维持社会秩序”^[12]。因此在罢工期间市区秩序井然。再者“由于说服了当地洪帮,而且得到了洪帮的帮助,在罢工期间所有的赌场和贩卖鸦片的地方都关闭停业了”^[13]。街道上的秩序反而比罢工前更好,这也都出乎市民的意料。

(二) 动员策略的历史意义

旧有的社会制度对工人群体的压迫是深重的,而共产党人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来解放工人,使他们从旧制度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获得新生,由此激发出了工人们高昂的革命精神和斗志。1922年9月安源路矿大罢工根源在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路矿工人的压迫,也在于李立三等共产党员的积极动员和组织。原本分散的路矿工人个体力量经党组织的集中带领,最终蜕变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生力军。

在整个罢工的过程中,李立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安源路矿的实际中去,创造性地提出三大动员策略并显现出了巨大的效用。一方面这种动员方式将工人纳入到党的组织体系之中,有效地将革命的队伍与革命的组织结合起来,为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使广大无产阶级团结了起来,激发了工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增强了工人的权利意识。李立三等人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是早期工人运动胜利的典范,其在创立工人群体组织、开设物质福利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动员三个方面所采取的三位一体式的动员策略,为之后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1] 蒋国海.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大罢工的斗争策略[J]. 湖湘论坛, 2018(5): 70-77.
- [2] 彭生林. 安源工人运动的辉煌历史及其启示[J]. 求实, 2004(4): 28-32.
- [3] 漆明, 文正再.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迅速兴起的秘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的民生工程建设[J]. 萍乡高等专

- 科学学校学报,2013(1):7-11.
- [4] 武云,朱明清.以工人为主体的工运史研究——读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J].广州社会科学,2003(1):164-166.
- [5] 龙长安,薛锦蓓.李立三与安源路矿罢工中的革命动员[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973-977.
- [6] 共党在安之教育概况(1928.9.26)[G]//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1369.
-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300.
- [8] 李思慎.中国工运历史人物传略:李立三[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21-22.
- [9] 裴宜理.重拾中国革命[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1-31.
- [10] 吕芳.论邓中夏的工人运动思想[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 [11]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册[G].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402-403.
- [12] 薛世孝.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刘少奇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7-13.
- [13] 李思慎.李立三安源大罢工的直接领导者[J].炎黄春秋,1998(8):22-26.

(责任编辑:夏玉玲)

(上接第31页)

参考文献:

- [1] 张培田,孙永波.民国京师检察第一要案史料刍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8):107.
- [2]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2集[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370.
- [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 白坚武.白坚武日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65.
- [5]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0-02(2).

(责任编辑:李亚平)